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 任雪山^{1,2}

- (1. 合肥学院 中文系, 安徽 合肥 230601;
2.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关键词〕文学;革命;梁启超;桐城派

1899年底,在乘船赴夏威夷途中,梁启超感慨万千,针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状况,他提出日后被文家一再论及的“文界革命”:

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氏在介绍严复的《原富》时,再次提到“文界革命”。其实,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梁启超连续抛出四个有强烈情感色彩的革命主张: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史界革命,跳荡文坛,力掣天下,一时引领整个社会文化风潮。陈平原认为只有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才会出现一人包揽四大革命的“奇迹”,^{〔2〕}王德威称系列“革命”主张为梁氏早期最重要的

作者简介:任雪山(1976—),合肥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现代学术视野中的桐城派文论研究”(AHSKQ2014D105)阶段性成果。

文学观，^[3]关爱和称他为“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4]革命，不只是梁启超贡献给时代的关键词，也是他品评桐城派的主要标准。不管是桐城学派的成立，还是桐城派开创者的判断，都以革命为准则，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或被鄙夷；即使是政治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正是以文界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学术视野下，梁启超对桐城派展开评论。

一、革命事业与桐城学派

一般提到桐城派，主要指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是否存在，各方意见并不一致。虽然方苞自谓“学行程朱之后”，不少人认为桐城派有文无学，章太炎就说：“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犹被轻蔑。”^[5]刘师培以“空议”、“空文”、“空疏”评价桐城诸家。^[6]梁启超不喜欢桐城派是出了名的，但提桐城学派的也是他，在《儒家哲学》一文，梁氏提出以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学派。这应该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桐城学派”的概念，且由一个自称不喜欢桐城派的人提出，更显得意义非凡。

梁启超并非一开始就承认桐城学派，而是经历了从不喜欢到适度认可，再到正式承认的思想历程。梁氏论桐城派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观点完全站在汉学立场，认为桐城派其学浅薄，与惠戴之学为敌，实在不自量力，惟有方东树抨击汉学，“其文辞斐然，论锋锐敏，所攻者间亦中症结。”^[7]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还是以汉学为主，对桐城之学基本全面否定，认为其在清代学界没有重要地位，甚至连文学也没有什么价值。但对方东树评价开始上升，称其以宋抗汉“亦为一种革命事业也”，^[8]批评汉学家也多切中要害，而此后出现的汉宋调和局面亦受他影响。

1924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不仅正式提出“桐城之学”，并溯其源流，历数桐城学派自方以智、钱澄之到方刘姚，再到方东树、曾国藩和一马二姚三百年辉煌家史。总体来说，梳理完整全面，评价相对客观公允。1927年的《儒家哲学》，梁氏提到清中叶以后出现四大潮流，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学派占据一席。他是这样论述桐城学派的：

桐城学派，以前实无可讲。嘉庆末年，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即方植之。他生当惠戴学派最盛行的时候，而能自出主张，不随流俗所尚，可谓特出之士了。汉学全盛之后，渐渐支离破碎，轻薄地攻击程朱，自己毫无卓见。方承这种流弊，起一极大反动，作《汉学商兑》、《书林扬解》，对汉学为猛烈攻击，主张恢复程朱。他对于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说，但在汉学全盛时代，作反抗运动，流弊深了，与他们一付清凉散吃，在思想界应有重要的地位……广东学风，采调和态度，不攻宋学，是受他的影响，此犹其小焉者。还有更多的影响，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为他刻文集……而他们与桐城关系极深，渊源有自，所以我们不能不认桐城为很大的学派。^[9]

由上可见，从1902到1927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发生了巨

大变化,梁启超对桐城派的态度和评价也发生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桐城派评价,由严厉批评到相对客观公允。其二,对桐城之学,由完全否定到正式承认。其三,以方东树为桐城学派的核心,认为其以宋抗汉是伟大革命事业。其四,曾国藩及其一派,对桐城学派成立居功至伟。在这四点中,又以对方东树的评价变化明显,可以说对方的评价直接关乎桐城学派的成立。从最初的“间或中症结”、“无法与汉学匹敌”,到“多切中其病”及汉宋调和,到最后称方东树为伟大人物,在思想界应有重要地位,成为桐城学派的中坚。这种变化背后,既有梁氏对方东树认识的变化,也有汉宋交替的时代影响。

关于方东树的主要成就,梁启超论及三点:一是对抗汉学,恢复程朱;二是影响广东学风,不攻宋学,采取调和态度;三是影响曾国藩,扩延桐城学派。应该说,这三点都很重要。首先,对抗汉学、守卫程朱可谓桐城派家法,从方姚到曾国藩,再到一马二姚都严格守护,特别是经历钱大昕对方苞的攻击和姚鼐与戴震交恶以后,他们和汉学家的矛盾越来越深,作为姚鼐得意门生的方东树对抗汉学也就在情理之中。其次,方东树与广东颇有渊源,他曾客居广东十年之久,佐幕两广总督阮元、邓廷桢,编修《广东通志》、《粤海关志》。尤其是在学海堂任首任学长,写作《汉学商兑》,给汉学家以很大刺激。此后学人,比如陈澧、曾国藩、朱一新等大都采取汉宋调和的态度,就连阮元撰《性命古训》亦有调和汉宋倾向,这些不能不说与方东树有关。其三,曾国藩私淑桐城派,天下皆知。而他真正接触桐城派主要是与梅曾亮、戴钧衡、方宗诚等人往来。至于他为方东树刻文集之事,据陈晓红考证不属实,^[10]仅在《仪卫轩文集》卷首,方宗诚提及曾氏曾有此意。当然曾氏为方东树和戴钧衡等人修墓之事,广为人知。综合以上三点,最核心的、也是梁启超盛赞方东树的,还是他单枪匹马以宋抗汉的革命精神,以及对此后汉宋调和学风的影响。

方东树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确实与他以宋攻汉有关,但其意义是否有梁启超说得那么伟大,后人看法不一。章太炎称《汉学商兑》“斥汉学之弊,颇有中肯语”,^[11]钱穆赞其持论纵横“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12]张舜徽赞其“言行骏快,文笔犀利,箴盲起废,足矫乾嘉诸儒之枉”。^[13]反对者也大有人在,皮锡瑞认为方东树“纯以私意肆其漫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14]朱维铮批评方著“一味漫骂,可谓罕有学术价值”。^[15]同一个问题竟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让人唏嘘感叹。笔者以为,方东树的批判抓住了汉学的弊端,打破了汉学的禁锢,顺应了时代潮流,为后来学界汉宋合流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桐城学派的提出是梁启超对桐城之学的肯定,桐城学派的存在,又以方东树为首。而梁启超所推崇方东树的,更主要是他对抗汉学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清学汉宋合流之风的影响。清代学术史概而言之,由初始的尊崇宋学,到乾嘉汉学的崛起,再到末期的汉宋合流,方东树可谓功不可没。

二、委身清廷与假道学先生

梁启超是非常尊崇先辈的，但对方苞很不客气。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他极为赞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当时大儒，对惠栋、戴震等乾嘉诸老也颇为肯定，对方苞却大加鞭笞，称他是假道学先生：

他是一位“大理学家”，又是一位“大文豪”。他曾替戴南山做了一篇文集的序，南山着了文字狱，他硬赖说那篇序是南山冒他名的。他和李恕谷号生死之交，恕谷死了，也作一篇墓志铭说恕谷因他的忠告背叛颜习斋了。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16]

方苞作为桐城派一代宗师，在有清一代及之后，批评赞扬的都大有人在，这里是比较严苛的批评，主要涉及方苞的五个方面：一，是否为大理学家；二，是否为大文豪；三，是否为《南山集》作序；四，是否给李塉墓志作伪；五，晚年殖财之事。说方苞是大文豪，显然是反讽，但其文学成就，不管在当时还是文学史来看，称一代大家不算为过。方苞为《南山集》作序，是他自己都承认的，且人证物证俱在，没有异议。至于晚年殖财之事，见于清代笔记《永宪录》，属于轶闻，其真实性尚难证明。如此一来，方苞是否为大理学家和给李塉作墓志之真伪，就成了考察重点。方苞果真如梁氏说得如此不堪，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方苞是否为大理学家

方苞是否为大理学家，梁启超是加了引号的，很显然他不认为方苞是什么大理学家。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时人和后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清史稿·方苞传》曰：“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17]由此来看，方苞在经学上颇有所成，而理学上并无多少建树。桐城派老对手汉学家江藩在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时，都没把方苞收录进去，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方苞算不上一位理学家。晚清理学振兴的标志性人物唐鉴，在其名著《国朝学案小识》中，全面梳理清代前中期约200年理学发展状况。该书以程朱理学为中心，按照成就高低分为三大类：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和守道学案。方苞属于守道学案，守道学案顾名思义，就是严守程朱之道，护卫理学之尊。具体到方苞学案，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总评，其二是学术观点介绍，其三是学术影响。学案是这样评方苞的：“其为文也，简而中乎理，精而尽乎事，隐约而曲，当乎人情，大抵根柢于史氏而游泳乎韩欧者也。”^[18]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准确的评价。准确在于，抓住了方苞古文的特点和渊源。有意思在于，评价一个理学家不谈其理，而谈其文，委婉地表达了方苞理学建树上的乏善可陈。他毕竟只是一个文学家，最多只是有理学素养的文学家，正如全祖望所言：“称公之文章，万口无异辞，而于经术已不过皮相之。”^[19]但方苞和一般古文家毕竟不同，其不同恰恰在于理学。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自朴学盛行以后，理学衰微不张，……理学之薪传，反为文学家所夺。”^[20]其

所言“文学家”指的正是以方苞为首的桐城派。晚明学风空疏,文风疲敝。方苞把理学引进古文,丰富了古文思想内涵,既是对空疏学风的救治,也顺应整个时代的求实之风。方苞和大批古文家以简约的古文阐释深邃的学理,又以流畅的文笔向世人传播理学,这不仅是唐宋以来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程朱理学的丰富和延展。由于在雍正、乾隆两朝长期担任清政府高层教育——“庶吉士”的教习任务,也由于替皇家编订时文制艺教科书《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等并颁布天下,所以方苞对理学的推崇对清代学人影响颇大。方苞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理学家,但对理学的扩展之功也不容抹杀,故被列入守道学案。

方苞理学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与李塨和王源的交往来呈现。李王二人都是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方苞关系深厚,且易子相教。他们都曾劝说方苞放弃程朱之学,改习颜李之学,而方苞却非常坚定信仰程朱。方苞与两个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上。程朱的观点,致知即格物,格物即穷理,强调的是内省体验和切己工夫,颇具先验色彩。颜李学派理解的格物就是践行,亲身体验,颇具经验色彩。李王与方苞的分歧可以说是程朱理学与颜李学派的分歧。方苞认为在性命伦常问题上,双方没有差别,所谓差别只是解释与侧重点不同而已:“窃以吾兄承习斋颜氏之学,著述多訾警朱子。习斋之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比如张、夏论交,曾、言议礼,各持所见,而不害其并未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诋訾哉?”^[21]不管方苞的理解是否正确,但他调和两者的意愿还是很清楚的。在他看来,两者一个重体验,一个重践行,双方并不否定彼此,只是路径方法不同。方苞说两人听了他的规劝后都改弦易张,实际不足信。他们可以说是各自保留意见,谁也没有说服谁。吴孟复说“望溪之学,同于颜李”“望溪之与颜李,始终无间”,^[22]这是看到兼容并包的一面;启超称之为“假道学先生”,这是看到诋毁卫道的一面。

方苞与理学的关系,他本人在《再与刘拙修书》中自己有一段话:

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劝以讲索,始寓目焉。其浅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则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谓自汉唐以来,以明道着书为己任者众矣,岂遂无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23]

由上可知,方苞接触理学较晚,二十岁之前没有读过宋儒的书,但一经过目就很喜欢,潜心二十年研习理学。他对宋五子评价很高,虽然显得武断,“但不无是处”。^[24]与宋儒比,方苞的理学显得更加平实。他认为:“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25]人心即人类的思想,天理不外乎人心,但人心未必都是

天理，只有人心所同者才是天理，也就是说天理是普遍的思想。天理存在于事物之中，一般人难以发现，只有圣人才可以发现。所以人和人之间认识是有差别的，学者的任务就是排除人们的疑惑，相信天理的存在。杨向奎说，如果方苞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或可成为一个思想家，但他却走上了另一条路。^[26]他处处表现出一个理学卫道者的形象，对有悖于程朱者大加鞭挞。

方苞卫道的第一个表现是对批判程朱者的批判。宋代以来，程朱理学为官方的思想统治工具，因为与封建专制政权的结合，使得程朱思想的顽固性与虚伪性越来越严重。明代中叶以后，随着阳明心学的出现和市民思想的萌芽，一些独立的思想家开始对程朱思想不满，在清代尤其突出。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程朱理学极度排斥，在《赠编修牟弃玉吴君墓志铭》中他说他们“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27]被梁启超称为有革命精神的颜李学派思想家颜元，更是从践行上攻击程朱学说，批判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观点，并宣称“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28]方苞对此展开严厉批评：“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东则黄君黎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29]

方苞卫道的第二个表现是对诋毁程朱者的诅咒。李塨老年丧子，作为好友的方苞不仅没安慰，还说什么“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30]并说颜习斋和毛西河都因为反对朱子而绝后。方苞这里已经不是什么学问，而是巫术与诅咒。按照他的理论，他也反对朱子，因为他的儿子也比他早死。实属无稽之谈。后来五四时期林纾用小说《荆生》对陈独秀、胡适等进行恐吓辱骂，与方苞可谓一脉相承。

方苞卫道的第三个表现是宣扬贞女节妇。在方苞文集中，有大量表彰烈女节妇的墓志传记。在《刘烈妇唐氏墓表》中，唐氏少时到股以疗其父。《方曰昆妻李氏墓表》记载方曰昆之父病重，李氏割己肉作羹喂食府君。《书孝妇魏氏诗后》记载魏氏割肱求疗其姑。方苞通过对“孝妇”的大加歌颂，宣扬没落的封建礼教观，不但今天看来摧残人性，当时即受到汉学家严厉批判，戴震和钱大昕等都曾经痛斥他礼教杀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方苞很难算得上一位理学家，即使是推崇理学的唐鉴也只好把他列为守道者，梁启超看不上他实属正常。虽然方苞提倡义法说，强调以理学来丰富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谓“言有物”，但是他的理学成就确实乏善可陈，更多时候只是守理卫道，沦为清廷的御用文人，与革命思想为敌，甚至以礼教来摧残人性、诅咒友朋，实在令人齿冷。

（二）方苞给李塨作墓志铭之纷争

雍正十一年（1733），李塨卒。方苞以老友之名为之作《李刚主墓志铭》。一般作墓志铭都会写墓主生平和主要事迹，而方苞这篇墓志铭有点特殊，主要内容是介绍墓主李塨和他与王源三人之间关于程朱的一个辩论，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听了他的规劝，幡然改过。原文相关内容如下：

昆绳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其后余出刑部狱，刚主来唁，以语昆绳者语之，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以刚主之笃信师说，以余一言而翻然改。

方苞此文所言是否属实是各方争论的重点。梁启超认为李塨不会因方苞的话而改弦更张，方苞纯属诬陷。不只是梁启超，李氏门人对此也非常不满。刘调赞评价此事：“暨先生歿，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屡陈其与先生及昆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徧徧曰以刚主之笃信师传，闻余一言而幡然改。其意欲故没先生之学而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31]刘调赞是李塨晚年收的得意门生，他认为方苞根本不算李塨朋友，只是诽谤其师之学而已。

李塨好像预测到死后有人会难为他，在卒前一年自己写了个《李子恕谷墓志》。从他的描述来看，他自始至终是谨遵师训的，且提及几位对他有大影响之人，但没有方苞，更不用说什么改过之事。可见在李塨那里，根本不承认此事。当然从两人年谱和文章来看，他们确实就此事有过多辩论，但最终都是各持己见。刘师培后来提及此事说：“其谓先生因方言改师法，何其诬先生之甚耶。”^[32]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和杨向奎的《清儒学案新编》亦持类似看法。可见后来学界对方苞为李塨作墓志一事大都有批评，且观点基本一致。

从掌握的各方资料来看，方苞在李塨墓志里的话确实不符合实际。尤其是说李氏“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实在是方苞的一厢情愿，李塨本人不承认，其弟子门徒不承认，学界也不承认。其所言“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塨遗著俱在。方苞与李氏争议的实质是清代程朱理学与颜李学派之争。余秉颐先生认为方苞对颜李学派的态度，反映了其思想上的保守落后，只知竭力维护程朱。^[33]笔者以为，不排除以上因素，但更主要还是学术之争，两人一生关系友好，但意见相左，互不相让。只是方苞做的有点过火，不该在人家的墓志铭上说三道四。不但与友不敬，与学术亦不公。

由上观之，方苞的很多做法确实不妥，梁启超也不是完全冤枉他。梁氏之所以批判方苞，首先是他以考证之学为清学正宗，而以理性为反动。而理学的末流，像熊赐履、张玉书、张伯行之类，在他眼里，更是空疏无学，而其中品格低下者更让梁启超看不起。梁氏称他们为“依草附木”的人，而真正有气节的学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他们却“挂着这个招牌，可以不消读书，只要口头上讲几句‘格物致知’就好了。”在梁启超眼里，他们只是一群没有风骨的“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34]而方苞就是代表，委身清府，为朝廷守理卫道，歌功颂德，所以梁启超批判他，虽然他文学上有自己的成就。

三、政治批判与开山之祖

梁启超看不起方苞，也很少谈姚鼐，但对戴名世非常推崇，认为“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35]戴名世是古文家，在当时和后

世应该都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否为开山之祖，则有两种观点。

（一）戴名世是否为桐城派开山祖

部分学者持肯定观点。柳亚子认为“戴名世与方苞齐名，同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36]吴孟复以桐城民间方、戴并称为由，将戴氏列为桐城派之祖。^[37]王树民主张“以戴氏为桐城派之先驱，绝非过分之言”。^[38]陈平原认为桐城派“本该戴、方并称才是”。^[39]综合各家观点，支持戴名世为开山祖的理由有四：1. 戴名世举起“振兴古文”的大旗，并提出以古文济时文的文学主张；2. 桐城派文论与戴名世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3. 戴名世奠定桐城派古文的文统：宗法六经汉唐，直接归有光；4. 方、戴并称文坛，且方苞的古文成就与戴名世分不开。以上四点，每一点都有充分证据，前人多有论述，本文略谈最后一点。戴氏有《方灵皋稿序》曰：“盖灵皋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40]可见，方、戴交往深厚，方苞古文确实受戴名世指点过。

另一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贺瑛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的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41]法国学者戴廷杰认为：“如果只是从各学者所依据的文学理论而论，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是很难证明的。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怎可能证明一个作家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呢？”^[42]曾光光提出学派开创者的三大条件：一，是否具备系统的学术观点；二，是否形成观点相近的学术团体；三，是否得到团体的普遍认可。^[43]他认为方苞三个条件都具备，而戴名世不具备。应该说，戴名世并非三个条件都不符合，最起码前两个条件是符合的，这个周中明、钟扬等人都有具体论证，第三个条件也另有隐情。综合否定者的意见，理由不外四条：一是桐城派的形成是在戴名世死后；二是桐城派背离了戴名世强烈的叛逆意识；三是戴名世的文风与后来的桐城派不同；四是是否得到派内人士的认可。我们逐条分析。

首先，桐城派到底何时形成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真正提出“桐城派”的是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而一般以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所言“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为桐城派确立的标志，那么在此之前，是否不算桐城派呢？当然不行。因为姚鼐自己说了方苞和刘大櫆，他没有提戴是因为《南山集》案的影响。因此不能以此否定戴的桐城派地位。第二，戴名世的叛逆意识，主要是王献永的观点，他认为桐城派形成原因“是由于它的创始人方苞背弃了戴名世与清王朝矛盾对立的这最根本的一面”。^[44]王的观点有点可笑，桐城派存在完全是因为与清政府合作，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主张。至于他大篇幅论证戴名世反叛清朝，也不能成立。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把戴的叛逆性格与反叛朝廷划等号，这与是否属于桐城派无必然关系。第三，就更难以成立了，虽然风格一致是衡量流派的基本准则，但不否认每个作家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纵观桐城派，方、刘、姚风格都不同，曾国藩又不同。所以不能以此定戴名世是否为桐城派。最后，是否得到派内认可，当然很重要。戴名世派被提的比较少，是

因为《南山集》案。但也不是没有提,方苞和戴钧衡都经常提及。

综上所述,通过正反两方面论证,我们同意梁启超的看法,戴名世不只是一位古文家,而且是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之祖,不管是从文学理论的传承,还是后来的持续影响来看,戴名世都当之无愧,不能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就否认其文学地位。

(二)《南山集》案原因

对于让戴名世遭难的《南山集》,梁启超为之鸣冤,认为戴氏只是普通文士,并无反抗清廷之意,但对官修明史“确有所不满”。梁启超认为,戴名世遭遇大祸是由于私下欲撰明史,以还原明亡真相,触怒清廷。^[45]这里梁启超实际涉及的是《南山集》案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反清,是修明史,抑或其他。

《南山集》案发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徐文博、石钟扬主张,《南山集》案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与民主启蒙思想相斗争的必然结果。^[46]王树民则认为:“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47]王先生的“偶然因素”是指满文方学士与方学诗同音,以致康熙误解,遂从严查办。张健认为戴氏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清王朝民族压迫政策和官场斗争的必然结果。^[48]张玉指出该案主要还是把文字狱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打击那些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各种思想意识。^[49]张兵、张毓洲认为戴案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戴名世的‘狂生’行径和孤傲自持不知收敛的个性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康熙帝的误会,废太子事件,朝臣的互相讦参,赵申乔掩饰其子夺魁之隐私,清廷对南明史事的敏感及对江南世家大族的忌恨等因素则无形中使本文字狱案越发显得扑朔迷离,并人为地扩大化了。”^[50]

综合以上原因,我们以为《南山集》案既有戴名世个人狂放的性格原因,更主要还是触怒清廷,危及清廷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致遭到迫害。梁启超看到了戴名世的冤屈,但对于背后的具体原因,并没有深入细致的探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为后来的研究者开启了一道闸门。

梁启超谈论戴名世文学其实很少,更多是对其史学成就的评价。梁氏高度评价戴氏修明史的宏愿,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门分析《南山集》中遗文数篇,以见其史才之特绝,认为其文章有天才,“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章实斋所逮。”^[51]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心目中戴名世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章学诚,而其特绝之处恰恰源自其文章天才。然而,正如王树人所言:“戴名世在史学方面具有较高的兴趣和志愿,尤其对于明史的修撰,其实际成就远远落后于主观愿望。”^[52]他的主要成就还是文学。而梁启超如此推崇戴名世,一方面是因为他卓越的文史才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狂放不羁的批判性格,不与清政府合作,敢于以史还原明亡真相,触怒清廷,表现出一介学人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

四、小 结

革命,是梁启超对时代的突出贡献,也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梁启超所谓

的文界革命,已经与晚清的改良有根本的不同。他曾经专门探讨过“革命”一词的意涵,从1902年的《释革》,到1904年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再到1913年的《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这是他文界革命之理论基础,陈建华称他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53]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的现代性,余虹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一,是文学目标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精英政治服务,而是为建立现代新中国服务,实现政治现代化。其二,文学形式的革命。与文学革命目标相适应,文学形式也相应要求通俗化与全民化,对小说、戏剧等通俗文体的推崇即是证明。其三,文学内容的革命。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内容就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民,建立现代国家。他的新小说,主要是内容新,为政治革命服务,张朋园也主张其内容更富有政治意义。^[54]所以余虹认为,梁启超革命之新,“并不在于它彻底更新了儒家诗文论的思想原则和思路,而是彻底更新了它的时代内涵,将现代性引入传统儒家文统诗教。”^[55]梁启超并不否认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工具性文道观,只不过以欧西之道代替孔孟之道,以通俗之文代替古雅之文。

从终极目标看,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并非为了文学,而是为他的政治现代化目标服务,所以他的文界革命被称为“政治化的文学革命之路”。^[56]梁启超是个政治与学术成就都极高的人,夏晓虹评价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便是梁启超的成功之路。”^[57]桐城派与政治和学术关系也极为密切,从戴名世蒙冤到方苞受三朝重用,从姚鼐离开四库馆到方东树对抗汉学,从“天下文章出桐城”到“桐城谬种”,应该说都与学术或政治有关。而在晚清,政治与革命又是时代的主旋律,所以革命成为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关键词。正是以革命为原则,在现代性学术视野下,梁启超对桐城派展开批评。桐城学派因方东树以宋抗汉的革命精神而存在,不革命而委身清廷的方苞受到鄙薄和挖苦,强烈批判清廷的戴名世则被推为桐城派之祖,刘大櫆和姚鼐由于在政治生活中的淡泊也很少出现在梁氏笔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对桐城派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研究,李泽厚称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58]桐城派批评只是他实现政治现代化目标的一部分而已。但就这一部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对桐城派的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注释:

[1][7][8][9][16][34][35][45][5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20、614、3093、4988、4482、4481、4517、4517-4518、4569页。

[2]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7页。

[3]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0页。

[4]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67页。

[5][6][11][32]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71、37、284页。

[10]陈晓红:《方东树著述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 [1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7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673页。
- [13]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58-359页。
- [14]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页。
- [15]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 [17]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72页。
- [18]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04页。
- [19] 全祖望:《鮑琦亭文集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156页。
- [2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51页。
- [21][23][25][29][30] 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第68-69,86-87,296,86-87,69页。
- [22]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
- [24][26]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册),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0,31页。
- [27]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 [28] 颜元:《习斋记余·未坠集序》,《颜元集》,中华书局,1983年,398页。
- [31] 冯辰:《清李恕谷先生(塔)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02页。
- [33] 余秉颐:《方苞与颜李学派》,《江淮论坛》1987年第3期,第99-100页。
- [36] 柳亚子:《南明史料书目提要》,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第91页。
- [37] 吴孟复:《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第74页。
- [38][40] 王树民编:《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4页。
- [39] 陈平原:《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界》2003年第5期,第234页。
- [41] 贺珏:《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Z1期,第27-28页。
- [42] 高黛英、戴廷杰:《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第149-150页。
- [43] 曾光光:《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 [44] 王献永:《戴名世与桐城派》,《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第302页。
- [46] 徐文博、石钟扬:《戴名世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45-46页。
- [47] 王树民:《〈南山集〉案的透视》,《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第89页。
- [48] 张健:《含冤千古的戴名世》,《文史知识》1994年第7期,第75-77页。
- [49] 张玉:《从新发现的档案谈戴名世〈南山集〉案》,《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第94页。
- [50] 张兵、张毓洲:《〈南山集〉案与桐城戴氏家族的衰落》,《文史哲》2009年第3期,第82页。
- [52]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470页。
- [53]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 [54]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222页。
- [55][56] 余虹:《晚清文学革命的两大现代性立场》,《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第227-228,228页。
- [57] 夏晓虹:《阅读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页。
- [58] 李泽厚:《中国近代史学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44页。

[责任编辑:钟 和]